

历史学评论

HISTORY REVIEW

【第一卷】

主 编 彭 卫

副 主 编 刘洪波 张 彤

执行编辑 曲鸣丽 曹江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 学界视野 ·

近三十年学风问题的思考

学风与学术批评 赵轶峰 (1)

关于学风的几点思考 杨 珍 (8)

学术翻译的质量必须重视

——《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

历史学部分读后 陈启能 (12)

努力建设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

——中国世界史研究学风建设刍议 于 沛 (19)

· 理论探讨 ·

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 李振宏 (24)

· 前沿视点 ·

内亚视角的北朝史 罗 新 (108)

21 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

影响与回应 定宜庄 [美] 欧立德 (116)

· 学科建设 ·

中国地图学史的解构 成一农 (147)

古代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路与方法 鲁西奇 (200)

21 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 “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

定宜庄 [美] 欧立德

导 论

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原来相对冷清的清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学科。从事该学科的学者人数之多，学术会议召开之频繁，发表论文数量之大，堪居史学诸学科之冠。尤其是自 2004 年启动“国家纂修清史”项目以来，在“盛世修史”思想指导下投入的空前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国内外其他诸人文学科望尘莫及。

回顾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发展，成果确实令人瞩目。成果的取得，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是为数甚巨的清代档案文献的开放以及整理出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明清档案曾与莫高窟藏经洞的出土文献、殷墟甲骨文以及汉晋木简一起，并称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四大发现”。^①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部分馆藏向学术界开放，尤使学者查阅利用明清档案有了远较从前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对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引进，已经构成这一时期清史研究的最突出特点。其中如对明清江南经济与人口的研究、华南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乃至对清代乡村、宗族等问题的研究、对下层社会和百姓生活史、心态史的研究等，都从西方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受到启发。也有一些，或是有中国学者参与，如美国“加州学派”对中国经

^① 此语出自王国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 5 册，台湾大通书局，1979，第 1987 页）

济史、人口史的研究,^① 或者就是中外学者共同合作的项目, 诸如以华南学者为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总之,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清史研究的进步, 与借鉴、吸收国外的理论与方法是分不开的, 与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日益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也成为越来越普遍采用的研究方式。换句话说, 中国历史学, 特别是清史学, 正逐渐地走向国际化、普世化和全球化。

正如上述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加州学派以及江南经济史学等新的研究趋势体现出来的一样, 总体来说, 国内学界对这些国外的理论、学说甚至史观、范式的吸收是积极主动的, 这从许多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概念都在中国流行一时就可以看出来。但在这样一种潮流之下, 却也有一个不和谐音, 那就是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新清史”。

一 “新清史”由来简述

“新清史”产生于何等样的学术背景, 它的学术源流又是什么, 已经有专文做详细阐述, 此处不赘。^② 简单说来, 它产生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 一是与清代档案、尤其是满文档案的新发现有着直接的重要关系; 二是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多方面的学术转向的影响, 这些学术转向包括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后殖民论转向、文化转向和族群转向等。总的来说, “新清史”包含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工程, 这点可以从它对于清帝国边疆地区的重视看出来。美国纽约大学的卫周安就写得很清楚:

这一修正性认识的核心内容, 就是新清史所揭示的: 在清鼎盛之时, 它并不视中原为他们帝国——远为辽阔的区域, 包括了亚洲腹地的疆域: 蒙古、西藏和东北 (今天有时称之为满洲) 和新疆——的核心, 只是一个部分而已, 尽管是

① 王晴佳在谈到美国加州学派时曾指出, 黄宗智等美国中国学家有关明清经济的研究, 与中国学者之间有大量的互动。其他许多美国的中国研究者, 其研究也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学界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接。举例来说, 近年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 (R. Bin Wong) 等人引人注目的中国研究, 虽然被许多人视为当今“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分, 但其实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的原始出发点, 与黄宗智的研究并无二致。他们都是想关注、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前近代” (early modern), 也即中国在资本主义入侵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所以他们与黄宗智等人一样, 都被视为“加州学派” (California School) 的成员。而这一学派的成员中, 也包括像李伯重这样的中国学者, 更可见中美两国学者的密切交流。参见王晴佳《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 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 《北京大学学报》2012 年 2 期。

② 可参见 [美] 欧立德 (Mark C. Elliott) 《满文档案与新清史》, 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 24 卷第 2 期, 2006, 第 1~18 页; 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 《史学月刊》2012 年第 6 期, 第 106~118 页; 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 (1980~2010): 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等等。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①

我们可以将这个“去中心化”工程的根本思路归纳为，它是对一些历来被人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历史叙事提出的挑战。对所谓“汉化论”的质疑可能是最典型的一例，中国史学界关注“新清史”，就是从有关“汉化”问题的一场争论开始的。

（一）争论的由来

概括说来，如果从1996年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全美亚洲年会上发表演讲《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②算起，这场有关清史研究的著名论争，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罗友枝（时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当时已年届八十的何炳棣（Ping-ti Ho）^③花费两年时间撰写了《我对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友枝“再观清代”一文的答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④一文。虽然这时尚未出现“新清史”这一名称，但这两篇文章可称为“新清史”出台的重要标志。

有关这场争论，国内目前的评介已经不少，但为下文表述方便起见，这里不得不再做一个简单回顾。罗友枝这篇《再观清代》的讲演，直接针对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的某些论断（何氏的这篇演讲本身当时也被视为西方学术界挑战学术主流的一个例证）。二人的议题都是讨论清朝的历史贡献。对于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对于清朝统治的成功，二人亦无异议。只是对于清朝统治成功的原因，罗友枝向何炳棣提出了挑战。她认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被汉人同化了，而是清统治者有效地利用了与内陆亚洲诸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尤其是在边疆地区。罗友枝认为满洲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反对将大清王朝与“中国”合二为一，强调以一种“满洲中心观”来评价大清帝国的重要性。

① [美] 卫周安著《“新清史”》，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原文见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005.

② 该文发表在当年10月的《亚洲研究月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Nov., 1996), pp. 829-850]。

③ 何炳棣生于1917年，卒于2012年。

④ 该文也载于《亚洲研究月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pp. 123-155]。顺便提一下，何炳棣回击罗友枝的文章题目，英文原文是“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据他自述，所谓“Defense”，是从拉丁语“defensa”而来，本义为“答辩”、“辩护”。为寻找这个合适的词汇，他曾反复斟酌，亦可见他对这篇文章的用心。他很担心中译者会随意翻译这个词汇（此据1999年5月26日笔者之一定宜庄与何炳棣教授在美国加州尔湾何家寓所的谈话）。但结果还是被一些译者漫不经心地将其译为“捍卫汉化”了。

何炳棣在回应罗友枝的文章中，则将重点集中在满洲统治者进入汉地之后是否“汉化”、汉化是否是清朝统治成功原因的问题上。他以“儒化”来代替通常使用的“汉化”一词并对所谓的“儒化”进行了详尽和深入的阐述，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凡非汉民族进入汉地，打破了原本的一统局面，在政权转移、又掺杂着尖锐复杂族群矛盾的局势下，当务之急都是要“争正朔、明法统”，^①努力将自己纳入华夏的正统链中。非汉民族只有争得了“正统”亦即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在汉地立足，并为进一步的开疆拓土打下基础，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

将二人的这场交锋称为“论战”未必准确，因为何炳棣尽管雄辩，但我们迄未见到罗友枝和她的支持者对他的正面答复。事实上，罗友枝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朝除开继承了明朝的领土之外，还开拓了大片疆土，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基本上没有长期被汉族王朝统治过，他们也未曾接受过任何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而这恰恰是清朝与明朝等中国传统王朝的区别，这是此前研究清史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不够的领域，也是何炳棣在文章中没有重视的问题。

（二）“新四书”及其他

在罗友枝与何炳棣的相关文章问世前后的短短几年间，美国清史学界几部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专著相继出版，议题都涉及清朝统治的满洲因素，势头之强劲令人惊诧，因为作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对于与满族史相关的清史研究，中国学界几十年中都鲜见如此集中地、大量地出版过如此重头的研究成果。^②

这几部后来被学界一些人誉为“新四书”的专著，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是：

1. 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③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张卫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① 所谓争“正统”，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争正统，亦即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争正朔。而广义的“正统”，即争“统治合法性”，含义要广得多。

② 这样说也不完全准确。在1990年到2001年之间，与所谓的“新四书”相继出版的时间几乎同时，中国国内也有相类的几部专著面世，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培养的几名清史满族史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均与“新四书”讨论的主题相关。这些论文后来都正式出版，以初版时间为序：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再版更名为《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古籍出版社，2003）、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再版更名为《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再版增订更名为《清初政治史探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等，但在学界从未被人放在一起作为一种学术现象看待，更未被视为一个“学派”。

③ 王笛：《评路康乐著〈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中，将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译为《末代皇帝：一个清代帝制的社会史》，按罗氏原文中的“皇帝”一词为复数，如果译为“末代皇帝”，容易让人产生该书是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的误解；至于将Pamela Crossley（中文名字为柯娇燕）译作P. K. 克拉斯利；Mark C. Elliott（中文名字为欧立德）译为M. C. 依利尔特，可能是不熟悉清史学界情况的缘故，虽然并未译错，但对于不懂英文的学者，容易产生歧义，特此予以说明。

社, 2009。

2. 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半透明的镜子: 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9。

3. 路康乐 (Edward J. M. Rhoads): 《满与汉: 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 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2000。王琴、刘润堂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 欧立德 (Mark C. Elliott): 《满洲之道: 清朝的八旗与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1。

除了这些著作之外, 柯娇燕早在1990年就曾撰写过一部在学界颇有影响的著作: 《孤军: 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终结》(*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关注了满洲族群意识和认同等问题, 并为学界视为经典。与此同时, 美国的《清史问题》199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也应该视为“新清史”的先兆, 一篇是柯娇燕的《前近代中国族群问题的思考》, 另一篇是欧立德的《旗人与民人: 十九世纪江南族群的张力》。^① 1994年夏, 美国学者在密歇根大学召开会议, 会后由米华健 (James Millward)、邓如萍 (Ruth Dunnell)、欧立德和傅雷 (Philippe Forêt) 等人主编出版论文集《新清帝国史: 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新清帝国史”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简称“新清史”) 一词从此成为这个清史研究学派的被公认的名称,^② 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未必认可, 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还将详述。而我们下文中还会一再将其称为“学派” (school), 为的则是叙述的方便。

事实上, “新清史”并未局限于对满洲的研究, 而是更进一步, 拓展延伸到宫廷活动、边疆政策乃至美术史等诸多领域。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成果, 有米华健1998年的《嘉峪关外: 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 白瑞霞 (Patricia Berger) 2003年的《虚静帝国: 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治权威》; 濮德培 (Peter Perdue) 2005年的《中国西征: 清朝对中亚的征服, 1600~1800年》; 艾宏展 (Johan Elverskog) 2006年的《我大清: 帝制中国晚期的蒙古人、佛教、与国家》; 张勉治 (Michael Chang) 2007年的《马背上的王朝: 满洲少数民族宗室统治在中国的建立,

① 柯娇燕文章原名为“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欧立德文章原名为“Bannerman and Townsman: Ethnic Te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iangnan”, 分别载于*Late Imperial China* 11. 1990, pp. 1-35, 36-74。

② 有中国学者说“新清史”其名是2005年欧立德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来的, 此说并不准确。

1751~1784》等。^①其中一些著作偏重于对清朝西北边疆的研究，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西北史地研究方式，而如美国学者所说，是希图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加以考察（“placing China in world history”），为中国研究提供一个“世界史视野”。^②

从“新清史”引发的讨论，目前仍有方兴未艾的趋势，对于“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名词，以及对“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被纳入“新清史”关注的内容，促使学界对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解析和思考。

二 从冷漠到热议：中国学术界与“新清史”的初次交锋

“新清史”发展至今已经十年有余，国内学界对它的态度，从开始时的冷漠到后来的关注，经历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过程。

2000年，定宜庄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一文，^③其中第二部分详细叙述了罗友枝与何炳棣的那场论争，也谈及“新四书”的出版。2002年，定宜庄又在《满族研究》发表《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④再次谈到罗何之争和所谓的“新四书”。但这两篇文章在清史和满族史学界没有引起丝毫反响。此后数年，虽亦有学者撰文介绍海外特别是美国的清史研究动态，如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2006年写的《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满洲史研究评述》，姚大力2007年的一篇书评：《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⑤，以及2006年欧立德以中文发表的《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可能是“新清史”的第一篇以中文发表的文章），引起了较多人的兴趣，^⑥但国内清

① James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 - 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1600 - 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ohan Elverskog,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② 参见〔美〕濮德培《中国的边界研究视角》，载〔美〕乔万尼·阿里占（Giovanni Arrighi）等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第71页。另见濮德培《中国西征》，第5、9页。

③ 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9期。并见朱政惠编《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第143~146页。

④ 《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⑤ 张瑞威：《历史人类学学刊》第4卷第1期（2006年4月），第93~112页；姚大力，《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⑥ 〔美〕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2期（2006），第16~18页。

史和满族史学界还是没有将这一学派的产生作为值得注意的学术动向提出来，回应者仍然寥寥无几，反而是研究中国史其他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反应积极得多。^①

直到2008年，当定宜庄为庆贺何炳棣教授九十寿辰再撰《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时，还坚持呼吁：

美国学界提出的“新清史”，从开始形成迄今已近十年，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可谓不深刻、不宏大，更不可谓无意义。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个在美国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在本应更切身、更受重视的中国清史学界，虽然也有过几篇报道问世，却几乎未引起任何认真的探讨与回应。其突出表现，就是清史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阐述数量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硬、调子越来越高，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却难以深入、难有突破。

如果说对美国学界的这些说法持不同意见，却未见有如何炳棣先生那样严肃认真的、高水平的反驳。如果对美国学界的讨论不屑一顾，那么，对于如此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尚且不屑一顾，还有什么更值得关注的呢？^②

在此旧话重提，并不是由于此语有什么重要，而只是为了说明当时学界的冷淡和沉默确实存在。

今天国内学界总结对“新清史”长达十多年忽视和沉默的原因，认为是因很多学者对其“持保留态度”和“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并不准确。事实很简单，那就是通晓外语、对西方学界动态也比较了解、通常承担着将欧美学界各种成果推介到国内的人们，并没有看到“新清史”的重要性，也没认为有必要予以理睬。再者，“新清史”最初受到冷遇，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它曾被清史学者归类到“满族史”也就是民族史的类别之中了，而满族史在清史研究中，虽然有以王钟翰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几十年的开拓耕耘，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却始终被视为清史学界的边缘。而很多研究清朝制度史、政治史的学者，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个学派与政治的深刻关联，只是一见“满族”便以为这仅仅属于“民族史”范畴，便予以无意识的轻视，亦属势所必然。

“新清史”终于进入中国学界视野的时候，它在美国已经发展了十年有余，掀起的第一个高潮也已经有了回落之势。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国内有关介绍和评判“新清史”的活动，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兴起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10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

① 例如葛兆光、姚大力、陆扬等知名学者。当然他们对“新清史”的了解并非来自定宜庄的文章。

② 定宜庄：《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以讨论“新清史”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作为这次会议的准备，人大清史所专门编选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论文集^①，会议之后，又结集出版了《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下两册，^②在国内清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此之后，对于“新清史”的评价，在学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有关的评论文章，在2010年前后也大多公诸于世，除正式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之外，也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相关访谈，以及在学术网站发表的议论等，^③近来更有越来越火爆之势。

“新清史”在出现十多年之后终于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并因此掀起一场波澜，与国家编纂清史工程的启动也有关系。在“盛世修史”思想的指导下，清史学界对“康乾盛世”和“大一统”的讨论一度成为清史学界最热门的主流话题，因而也必然会着力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解释，并进而关注到清朝的边疆民族问题，而一旦将目光集中到这些问题上，便不可避免地会与“新清史”发生直接的碰撞。

所以，“新清史”在中国学界成为关注焦点，始发轫者并不是满学界，而是以研究政治史、制度史为主的学者。于是，这个来自西方世界的不和谐音虽然缓慢，却恰逢其时地进入中国清史学界的视野。很多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学派及其提出的学说，已经不仅仅是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入流”的民族史，它已经影响甚至颠覆了主流话语中最根本的、根深蒂固的诸多观念。笔者以为，这便是自2007年以后，对“新清史”的认识、了解和批评被列入日程，也被作为政治问题而重视起来的原因。^④

“新清史”在中国冷寂多年之后又成为热点的另一个原因，是新一代学者的成长。相比老一辈的学者，他们思维更活跃、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受到过更多西方理论和外语训练，对于“新清史”表现出了远较老一代学者更强烈的兴趣。近年来

① 刘凤云、刘文鹏主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② 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③ 2010年发表的论文等包括袁剑《“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9日；关凯《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8期，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党为著《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该论文在2012年以《美国新清史三十年（1980~2010）：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

④ 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清史论丛》集中发表了若干篇介绍“新清史”的译著，也是“新清史”最终得到学界关注的原因。这些译文如马钊《满学：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1990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一》，《清史译丛》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孙静《满族民族认同的历史追寻——柯娇燕满族研究评价》，《清史译丛》第3辑，2005；〔美〕盖博坚《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孙静译，《清史译丛》第7辑，2008；张瑞威《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来满洲史研究述评》，《清史译丛》第7辑，2008；〔美〕卫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等等。

一些论述“新清史”的文章和专著，都出自他们之手，有些就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

目前，“新清史”在中国的影响所及，已经不仅限于清史学界，而波及中国古史的各个断代以及近现代史的一些领域，同时也波及其他相关学科，已经有年轻学者在思考“新清史”的人类学转向等问题。所以，重视“新清史”提出的挑战并予以严肃认真的思考和回应，已经是一件难以回避的事了。

三 冲击与回应：“新清史”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

在下文中，笔者拟将讨论几个由“新清史”提出并最受关注的概念，但重点不在介绍“新清史”学者的观点本身，因为相关的文章已有很多，而重在阐述笔者的一些看法，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一）“新清史”新在何处

“新清史”相对于所谓的传统清史研究，究竟是否有所创新，又究竟“新”在何处，近年来国内有大量文章论述，已经成为一个老问题了。但其中有些问题，迄今仍为国内学者忽视，有必要再作些交代。

首先，很多美国学者并不认可“新清史”是一个学派，他们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方向，一种方法，无非是各自撰写各自的书、研究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而已。即使被看作是代表人物的几位，在相关问题的立论、观点和阐述上也多有分歧，甚至到了很难将它再说成是一个“学派”的程度。这本是美国学术界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既如上文提到的“加州学派”，不同学者之间观点的歧义和交锋也相当尖锐，甚至彼此对立。

再者，“新清史”从那场著名的争论算起，迄今已经十七八年，著作的出版时间也有先有后，随着史料的不断扩充、思考的不断深化、观念的不断更新，“新清史”关注的焦点也必然会有所转移。当然即使如此，被作为“新清史”代表人物的诸位学者，还是可以说有共同的研究取向和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他们被看作是一个学派的原因。

那么，能够代表“新清史”学派的共同观点有哪些呢？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全球化的视角。“新清史”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全球史”——的范畴来研究，特别是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帝国与世界同时代（即前近代，或者近代前期，日本学者说近世，即 early modern）的其他帝国，尤其是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相对）进行比较分析。这种视角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各

种方法上的问题，包括断代法的问题。

第二，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清朝的政治制度以及对各非汉族群的统治政策，对于清朝的成功统治，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解释清朝的少数民族统治之所以成功的传统汉化论不同，“新清史”认为清朝统治的成功，正是因为满洲人没有被完全“同化”，尽管他们的涵化（acculturation）已经到相当深的程度，但一直到清末，仍然保留了满洲特殊的族群认同。

第三，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新清史”将其称为“非汉族群”）语言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充分利用满文（蒙古文、藏文、察合台文等）档案，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也是以满洲或其他非汉族群为主体进行研究的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概括了“新清史”在方法论、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史料三个层次上的创新。

不过，这些是否确实是“新清史”所创之“新”？部分中国学者对此有所保留，刘小萌教授的话比较有代表性：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有些学者将“新清史”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我认为，这种概括不准确。上述两特点，中日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长期实践，尤其在利用满文、蒙文文献考证史实方面，均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无视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成果，将两特点作为一种“新”的发明而归功于“新清史”，这种说法是否合适，答案不言自明。更何况，即使是在西方，早年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有关东北边疆与满族的论文，也已提出类似新清史有关清朝满族性的观点。^①

葛兆光在 2009 年的一次谈话中也明确发表过如下见解：

我们现在都知道新清史，新清史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影响了后来的这批年轻学者。新清史最简单的概括是，不再把清史看成中国的王朝史，而是看成一个更广泛区域的、多民族的历史。在最近这些年，欧美学者，尤其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联手，新清史的运动趋向是很厉害的……但是还要看到另外的问题，其实新

^① 见刘小萌 2010 年 9 月 21 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青年同仁的读书会所做《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的报告，该报告中的这部分内容，也被作者收入《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一文，载《清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并再刊载于 2012 年出版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 156~165 页。

清史并不新，老实说是旧清史。为什么是旧清史，在中国的晚清民初，日本明治大政时代，日本最早的东洋史就已经凸显对蒙、回、藏的研究。当时的日本为了改变中国中心，对于中国的政治和当时国家领土有一个新的解释，是有政治背景在后面的……现在美国的新清史，一方面有新的学术推动力在，和新的学术增加的成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跟过去日本东洋史初期的关联性，这个关联性是很深的。在新的清史研究里面，中国学者要理解美国中国学和美国清史的变化，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背景，看到在中国怎么样接受和区分，以及坚持自己研究的立场。^①

本来，任何一个新观点的创立、一个新问题的提出，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的确，提倡用满、蒙等非汉民族文字形成的档案史料来研究清史，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都不是自“新清史”始。“新清史”学者自己也多次提到，他们对满文史料和清朝的满洲因素的重视，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是渊源有自。本文作者之一欧立德早在2001年出版的《满洲之道》一书序言中已经做了如下叙述：

这个论点〔即满洲人重视保留原有的特殊性〕就涉及二次大战以前由日本学者发展出来的最完整的一个主题。他们把满洲人制造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隔离解释为所谓“异民族统治”的关键策略。在他们看来，清王朝统治的三个“保守特征”都与防范同化和维持“首崇满洲”这两种政策很有关系。^②

在另一处，他有更详细的解释：

诸如稻叶岩吉、和田清、浦廉一、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宫崎市定等人所创立的学术传统，都强调了满洲统治精英的独特性，以及“满洲”这个区域的独特的历史地理。不能否认，他们这些学术著作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了证明“满洲”不属于“中国”，以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的扩张寻找借口，并通过这个手段来开创中国“异民族统治”的历史先例。但是，这些学者们对清王朝的认知还是有它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他们对于内陆亚洲这个地方的历史和语言的深入了解。因此，即使当时他们这个学术有着很浓的政治色彩，然而有关清

① 葛兆光的这次谈话刊载于〔美〕艾尔曼等《对话：美国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兼谈〈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暨〈剑桥中国史〉系列出版意义》，2009年12月。

②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6-7.

代各种制度和典章的叙述与分析应该说还是有诸多正确之处。^①

此外，欧立德 2005 年在台北故宫一次会议上的主题演讲《满文档案与新清史》中，也曾具体介绍过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几乎同时在台湾、中国大陆和日本发生的”影响到“新清史”的学术动向与来源，明确指出这些并非来自西方的学术来源正是“新清史”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② 应该补充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不少日本学者，诸如冈田英弘、细谷良夫、石桥崇雄、楠木贤道、冈洋树、杉山彦明等人，他们采取的研究途径也与“新清史”的主张基本一致。可知这种注重满洲因素、利用满文文献处理清代历史的做法，并非唯美国人独有的。^③

这些学术动向，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陈捷先和庄吉发在发现并非所有的满文档案都有汉文版本后，首先提出满文在研究满洲入关后的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性；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培训了一批年轻学者来着手整理该馆的满文收藏，而该馆在《历史档案》创刊号上刊载了满文史料的汉译，使满文档案的重要性被国内外学术界所体认。同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王钟翰教授要求所招收的研究生都要学习满文，并于 1986 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创办“满文清史班”，尝试培养一批将满文与清史研究结合的研究人才，等等。这些成果算不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暂可不论，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由“新清史”学者自己列举出来并承认从中受到很大影响的因素。许多学者也提到中国老一辈清史学者诸如孟森、金毓黻、冯家升、傅斯年和莫东寅等人的贡献和从他们那里接受的影响，孟森的影响尤深。与此同时，欧立德、柯娇燕等“新清史”的代表人物也一再提到西方的前辈学者如拉铁摩尔、梅谷（Franz Michael）、福华德（Walter Fuchs）、魏特夫（Karl Wittfogel）、弗莱彻（Joseph Fletcher）、芮玛丽（Mary Wright）、史景迁（Jonathan Spence）、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以及孔飞力（Philip Kuhn）的研究对“新清史”产生的影响。由此可知，“新清史”的“新”，本身即是国际学术界，以及历代学者群体内互动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果。

再者，虽然“新清史”确实并不是全新的，但同时也还是要承认，它对清史学界的冲击是新的，引起的争论也是新的。我们上面已经指出，“新清史”源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潮流和档案资料的新发现，而绝非像一百年前跟随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发展的、与政治互相纠缠的东洋史。

①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p. 31 - 32.

② [美] 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 24 卷第 2 期（2006），第 16 ~ 18 页。

③ 可参阅 [日] 楠木贤道《“两国盟盟录”中所见志筑忠雄与安部龙平对清朝北亚之理解——江户时代知识分子的“新清史”》：“日本在 200 年前，早已存在所谓 New Qing History（新清史）的研究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编《民族史研究》第 9 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第 425 页。

尽管如此，人们可能还要问，既然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和日本的史学传统中始终存在与“新清史”相同的核心思想和方法，那又为什么非要等到美国学者再次将其提出来，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是一个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中尝试做出详细的解释。

（二）对“以满洲人为历史主体”的理解

刘小萌尽管对“新清史”有所质疑，但也明确肯定了“新清史”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等方面的创新和贡献。李爱勇发表于 2012 年的《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一文中，也认为“新清史”之新，就在于理论与视角的新运用。但是，所谓理论与视角的创新，说起来简单，不同人的理解却各有不同。有学者认为，在我们上面介绍到的“新清史”三点创新之中，第一点算是视角，第三点只是工具，第二点才是要害所在。笔者却认为，这三点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新清史”力图将以往传统的以汉族为历史主体的视角，转换到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满洲人之上。他们通过这种转换，发现了清朝与传统的汉族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的差异，也通过这种转换，来观察非汉地区的诸族群对于清朝皇帝、清朝朝廷的态度。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从“汉人中心观”向所谓“满洲人中心观”的转换。

研究视角的不断转换和更新，本是西方学界不断挑战陈说、不断颠覆固有囿见而力求学术持续发展的一种常态。每一次视角的转换，往往会引发学术上的一场革命，为学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重要的契机，并引领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即以对中国的研究来说，从 20 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就经历了从早期以欧洲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理念与视角的转换，试图以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动力重估中国的历史发展。在柯文（Paul Cohen）的一部极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①中，就提出应将中国视为影响整个世界的一个区域，因而试图将中国研究视为一个“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观点，这代表了西方人中国观的一个根本改变，被评价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毕竟，中国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在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对世界历史产生着很大影响。

“新清史”则是针对清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又一次对历史主体的研究视角的转换。而这种以满洲人为历史主体的变换，的确使我们感受到以不同的话语所叙述的清史，乃至受它影响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有着与传统视角看到的清史的重要区别。

西方学者从欧洲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的转换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至少是没

^① 柯文（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

有受到多少阻力，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西方学者强调的“中国中心观”，与中国学者的爱国意愿和对民族国家的叙述恰恰相合。西方搞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人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探究，与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的既成观点，至少在研究的开始阶段，并无明显的冲突。

然而，“新清史”在中国的遭遇却大不相同。尽管清朝的创立者是明朝时僻处于辽东边墙外的女真人，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汉人”，尽管这个由非汉族群建立的王朝统治中国的时间长达三百年之久，并始终以八旗制度将自己置于“国中之国”的地位，在法律上、社会地位上和婚姻上与其他人群“未尝一日与混合”^①，因此而导致的族群间的隔阂成为清末革命派提出“驱逐鞑虏”口号的动因之一。但将满洲人作为清王朝的一个“历史主体”，学界却仍然难以接受。提出诘难者有之，明确表示无法接受者有之，甚至有人怀有明显的反感和敌意。黄兴涛教授针对这一问题发表的一段话，就颇有代表性：

（“新清史”）强调满洲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洲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对于丰富清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但在正视清朝历史这一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有意无意地轻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化地对立起来。

作者很准确地把握到“新清史”之新的关键，即强调满洲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洲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尽管对“新清史”的这一视角仍然坚持其不肯接受的态度。他也同样敏锐地抓住了“新清史”所具有的颠覆性所在，那就是“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只不过这个“中国性”又是什么，作者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对于“中国性”及其相关问题，本文拟于下文详述。

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对黄教授提到的“主体性”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历史主体”这个词汇，做一番说明。因为对于“以满洲人为历史主体”的说法产生的诸多分歧，有一部分就是从对这一名词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

许多学者无法接受“新清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主体”一词理解的歧误。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主体”（historical subject）指的是社会历史活动的承担、发动和实施者，即个人、阶级、政党、人民群众等。这是从宏观上、相对于西方传统上将上帝即“神”（即德语的 Geist）看作历史主体而言的。而 20 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社会理论中经常提到的“历史主体”，亦即 historical subject（或者说 historical agent），指的则是凡是有自己的主体性，有自己的历史叙述、有推动历史发展能力的

^①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 218 页。

所有族群和个人。所以，当我们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时代书写历史的时候，我们将那些有自主权，有自我赋权（agency）的活动者（actors）都视为历史主体。这就是说，“历史主体”并不是唯一的，而很可能是多元的，它甚至也不一定是主要的、中心的“那一个”。

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们可以用社会性别（gender）的研究来做例子。社会性别当今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当这些社会性别的研究者将视野投射到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时，已经不再将那时候的妇女仅仅看作是被压迫的被动的群体，而是脱离以往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转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他们强调妇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强调女性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受男人压迫的一方，而是与男人一样的历史主体。乃至提出“赋历史以性别”的倡议。总之，将妇女的历史、将社会性别研究纳入研究范畴，并不意味着否认男人在历史上的主体性。

“新清史”提出将满洲人作为历史主体，恰恰与“赋历史以性别”的诉求相合。强调满洲人的主体性，并不是否定其他族群（主要是汉族）的主体性。它所颠覆的，只是那种将清朝的满洲人看成一个从整体上被汉化的、已经在社会和历史上消失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人群而已。就像对社会性别的强调一样，“新清史”也并未简单化地将满汉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希望研究者更多地注重他们的互动。当然，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必须将满洲人视为一个保留着自己的族群认同的群体，这正是我们以往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的。

（三）“满洲汉化”问题

满洲人在有清一代是否被汉化（Sinicization），这是“新清史”与反对者展开交锋的首要问题，也是多年来最受关注的问题。何炳棣回应罗友枝的文章，题目就是《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这场争论也许过于吸引众人目光了，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满洲是否“汉化”的问题之上，一提“新清史”，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对有关“汉化”的争论，甚至以为这就是“新清史”的唯一观点。

但问题在于，即使仅就“汉化”一事而言，“新清史”的论点也未必被学界完整而充分地认知。笔者之一欧立德就曾为自己做出辩解，说他从未否认满洲人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上的变化趋势一直存在，而且越到清末就越明显：“新清史，至少我个人，只是反对用‘汉化’这个词来描写这个过程，因为‘汉化’包含着一种必然性的含义，也包含着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味道，因为好像它忽略汉人受满洲人影响的可能性。”^①这里所说的“必然性”，指的是根植于学界和普通民众中的、已经根深蒂固的对“汉化”模式的阐释，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中，汉族都是以文明的、文化

^① [美] 欧立德：《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演讲，2013年5月6日。

发达的进步民族的形象出现的，那些处于汉地边缘的其他民族相对而言都是落后的、文明程度不如汉人的；即使他们以武力征服了先进的汉族，最终也必然被先进的汉族从文化上征服，亦即古人习称的“夷狄入中国者则中国之”的含义。文明必然战胜野蛮、先进必然战胜落后，这就是支配或引导中原和周边诸族之间各个层次的关系，是“汉化”的实质，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唯一”的规律，清朝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够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就在于满洲的彻底汉化。这种既成的、被人广为认知的说法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就是有清一代的满洲人已经彻底变成了汉人，这当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新清史”学者主张用“涵化”（acculturation）一词来描述这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涵化”的过程并非那么简单，那么单方面，而往往是复杂的、时进时退的，也往往是不平衡的。而用“涵化”一词，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不同人群长期相处时发生的各种变化、妥协、抵抗等行为，也才能够承认个人在认同问题上的非单一性。即以满洲人来说，他们虽然受到周围汉人的深刻影响，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但整个有清一代，即使说的是汉语，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满洲人。汉人也一样，尽管他们身边的满洲人（旗人）已经都讲汉语，他们仍然将这些人视为满洲人而绝不会将其与“民人”^①等同。清朝被推翻之后，满洲人身上还存在一种“缺乏向外标志的内在认同感”^②，这便是族群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分析的问题。

“汉化”一词的另一个缺陷，是容易造成某种误解，以为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是古代史中的一种“中国模式”。而事实上，众所周知，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相碰撞、摩擦、混合、吸收和排斥，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生活在中原的人希图将自己的华夏文明、儒家文化传播到周边那些被视为“野蛮人”的人群中，以为这是在提高这些“野蛮人”的素质，是在改变他们落后的风俗习惯。其实，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都有如此表现，无论罗马帝国，还是西班牙、大英帝国、沙俄帝国，乃至日本和美国，都或多或少地以为自己承担着一项神圣的“文明使命”（即法文的 mission civilisatrice），但最后的结果，却总是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交融，而不是单方面的“同化”。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

总之，“新清史”从来不认为满洲人没有受到汉人的影响，只是认为用“汉化”二字来描述这一现象，一则会显得过于简单，一则也显得过于例外和特殊。国内满族史学界早就有人提出汉人也有被满洲人涵化的问题，并主张用“满化”一词来解释

① 按清朝户籍分为“旗籍”与“民籍”二种，凡八旗制度下的属民均为旗人，入旗籍；其余未入旗者为民人，入民籍。旗人与民人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都有严格区分。在讨论清代族群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用“民人”来指代旗人以外的人、以汉人为多数的人群，比用“汉人”更准确些，也更符合历史事实。

② 对于历史上各个帝国在族群问题上的比较与分析，可参见 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Empire & ‘Civilizing’ Missions, Past & Present,” *Daedalus* 134. 2 (Spring 2005), pp. 34 - 45。

这一现象,但我们认为,无论“汉化”还是“满化”,指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单向的、绝对的同化过程,其实都是不准确的。^①

“新清史”为什么如此重视有关“汉化”的争论呢?这牵涉到满洲统治者的自我认同以及满洲人整体的族群认同问题,这也就是“新清史”学者所谓的“非汉因素”之义。他们认为清朝统治的成功,在于保持两个基点之间的平衡。这两个基点,一个是通过争“正统”来取得汉族士大夫集团的认可和统治的合法性(这点与上述何炳棣的论点相合);另一个基点,则是保持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威望和权力。要保持统治集团的权力,就必须极力设法维持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维持在人口上仅占少数的满洲人和人口占多数的民人(汉人)之间的隔离格局。而维持这种隔离格局的前提,就是竭力避免被同化,只有不被同化,只有尽量以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各种机制和措施来保护满洲人的族群认同,才能够找到这样的平衡。因此,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便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特征。他们这一观点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将认同理论运用于对满洲汉化问题的分析上。尽管“新清史”的学者之间关于满洲人的认同观的意见未必一致,但他们都承认,保持统治集团一贯的身份认同,是解释满洲人统治得到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以往一直是被忽略的。^②

(四) 对“中国”和“帝国”的理解

在上文中提到,“新清史”对“汉化”的处理方式,是将其视为所有帝国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的现象,这部分地是来自“新清史”提倡的“全球化的视角”,另外,也来自对“满洲因素”和“利用满文史料”两点的强调。在本节中我们要讨论的是由“新清史”引发的对有关“大清”、“帝国”以及“中国”等一系列定义的争论。这同样与“全球化的视角”直接相关,因为只要我们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的、人类的历史中去理解观察,我们就不再能坚持说,中国历史是独一无二的,至少不可能说中国历史的“独一无二”性质与其他地方的“独一无二”性质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各种措施和各种经验,都有可能拿来与世界历史上其他的经验、制度和措施相比较。当然,做这种比较并非易事,它需要有坚实的史料作证据,需要根据史学理论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但是,进行这样的历史比

^① 杨念群也注意到“汉化”一词的不妥并强调:使用“汉化”一词更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单纯的种族论叙述,似乎任何外来民族只能单向接受汉民族的文化熏陶。如果改用“华化”一词则无问题,因为“华化”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多元共同体的交融过程,至少在相互遭遇时呈现出双向交流的局面,是不同文明多向交流的结果,而非单一的种族对其他民族的单向文化塑造。《超越“汉化论”、“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载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123页。

^② 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可参见 Mark Elliott, “Ethnicity in the Qing Eight Banners,” in Pamela Crossley, Helen Siu, and Donald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 32–35。

较，实在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在我们大家都身处的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因为如果我们不努力把我们的想法和结论传递给全世界关心类似问题的学者的话，我们学术成果的传播就会受到很大局限，甚至沦为一种无人理睬的自言自语。除非我们用一种相对精神，而不是绝对精神来做研究，我们就很难把我们在中国历史里面发掘出来的真实的教训和模式传达给在别的领域工作的同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研究只会越来越孤立。如果我们的学生从我们手中接续的是这样的遗产，前景将会很不利。

在“新清史”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既成观点的碰撞中，引起的争论最激烈的，可能就是关于满洲统治者的“中国认同”问题了。这个问题可以分若干层面来看，其中涉及对“帝国”的理解，也就是“大一统”论与“前近代帝国”论之间的矛盾；也涉及对“大清国”的理解，也就是有关“清王朝”是否等同于“中国”的辩论，下文一一述之：

第一个问题，“大一统”论与“前近代帝国”论。

国内大多数清史学家是同意将清朝称为帝国（empire）的，认为将清朝作为帝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统一了天下，实现了“大一统”的理想。按照郭成康的说法：“康雍乾时期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伟业，具体来说，就是将‘天下’第一重空间纳入‘中国’版图，使居住在那里的民族‘中国’化。”^①

请注意，这里“天下”、“中国”两个词都带引号，表明了郭教授对这些名词所持的谨慎态度，因为他准确地意识到这种词汇的可变性、模糊性。他没有用“帝国”一词来描述清朝在内陆亚洲的这一扩张趋势，而是用“大一统”来取代它，那可能是因为“帝国”一词是最近五六年以来才被普遍运用的，在他撰写这篇文章时，人们通行的用语是“大一统”。但问题是，当我们以“大一统”这样的提法来描述清朝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方的军事征服和行政管辖时，我们的立场是否与清朝政府的立场太接近了？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一种与清朝统治者的客观距离呢？

总之，如果我们想要对清代历史做出更为全面、更为客观的叙述，就必须注意到那些“他者”的立场和观点，这些他者不唯是满洲人，也包括蒙古人、藏人，以及吐鲁番、喀什等地的突厥人，还有西南地区的苗人、傣人等。

所以“新清史”提出，既然“大一统”的提法代表的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种提法放弃？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注意到要对边疆问题、对非汉人群在帝国中的地位和经验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而不是仅仅从中央（无论是满洲人还是汉人）对他们的统治政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仅仅这样仍然是不

^① 郭成康：《大清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够的，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从周边看中央政权的角度。毕竟，政府的决策再重要，也只不过是历史事实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而且，如果我们坚持使用“大一统”这个用语，我们将大清国的扩张过程置于一个比较的框架里的想法就很难实现。这个比较的框架，应该就是前近代帝国的框架，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将清王朝和世界上曾与它并存的其他大帝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只有这样做，才能对一个关键的问题做出回答，这就是接下来的：

第二个问题，大清国是不是一个帝国（empire）？

中文里本来并没有“帝国”一词，直到清末才有人开始用“帝国”来指代大清。因此，与奥斯曼帝国、罗曼诺夫帝国不同，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术语来论证大清是否具有帝国性质，还需要根据大清国在制度上的一些特点，从对清朝中央与边缘关系的模式入手，来探讨大清的“帝国性”或曰“帝制性”。

“新清史”对“帝国”的理解与国内大多数学者惯常的理解不同。在将中国作为“帝国”来考虑的时候，西方人往往会转向他们更为熟知的罗马。罗马最先的独裁者屋大维（前63—14）和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的做法，都是将不同的人群、语言和信仰体系汇集成一个单一的但又有着不同组织结构和不对称的政治秩序的整体，称之为“*imperium Romanum*”。*Imperium*即“超越势力”，意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势力，也就是主权，是为专制者一个人所有的，也包括一种神圣的含义。作为一种政权构成形式，这种帝国的概念不仅基于征服而且基于所创建的能够“有条件地包容差异性”的“主权分层”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之上建立的法律和管理体系，这是将帝国与民族国家区别开来的关键。这个概念在近年来的社会理论中已经出现了。^①

我们认为，这种对帝国的理解也非常适用于对清王朝的分析。不仅清朝八旗劲旅的武力征服符合“超越势力”之义，同时，比起此前的明王朝，清朝显然享有族群的多元性和更广阔的疆域范围，这一现实也为清朝涂抹上了帝国的色彩。就像其他曾在中国创立的“帝国”一样，清国也用“天命”作为其政权合法性（“正统”）的基础，控制被它一统的领地（天下，拉丁文为 *orbis terrarum*）。不仅如此，有赖于近年来对其他前近代帝国研究的学术成果的启发，我们发现了更多可以将清朝视为一个“帝国”的视角，这些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论证的更多方法，但在这里，我们仅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与行政为例。

简单地说，清朝管理内亚边疆（满洲、蒙古、西藏和现在的新疆地区）的政策，

^① 可参考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是一个混乱复杂的集合体。由于各边疆地区是在清朝前半期（大约从 1618 年到 1758 年的 140 余年间）次第纳入清朝版图的，有着各自特殊的状况，所以清朝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制定的特殊政策，以及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所作的进一步调整，就构成了这个政策集合。清朝中央政权采取弹性的统治政策，随时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也任用当地的主权或宗主权系统来进行统治。此外，清帝国的决策者还采取分而治之的措施，尽量把各个族群互相隔离，让他们仅仅对中央效忠，以维护清廷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为达到此目的，朝廷采用了各种方式，如编纂地图、撰写人种志、编纂各种典章制度和则例等。不同地区行政系统的差别，以及它们与内地行省的管理体制有天壤之别的事实，正是“帝国”式管理体系的标志性特征。而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我们才能够摆脱“大一统”的陈说，进一步了解“清朝式”管理政策与其他帝国的同异，并且发现它不同于他国的特点。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大清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新清史”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清代的各种制度和观念与历代中原王朝相比，有很多相同也有很多不同；除了接纳中原汉族王朝的传统以外，满洲统治者也吸收了内陆亚洲政治传统的许多因素。^① 所以，“新清史”主张要重新思考清代在中国历代王朝替代过程中的地位，强调清朝并不能被漫不经心地定性为“又一个中国王朝”，因为它有它的独特性。当然，不仅仅是清朝，而是每个王朝都有它的独特性，也都是独立的政权，所以每一个王朝都存在与“中国”的关系，也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深入地思考。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王朝都拥有自己具体的历史性存在和性质，但是“中国”却与每个具体的朝代都不一样，它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比较笼统而容易改变的信念和概念。

对“中国”的这种解释，是“新清史”诸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作为一个持续进展的具有不同形式、实践和理念的合成体，“中国”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纯粹的中国或纯粹的“中国性”。所谓“中国”和“中国性”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是多样性的，而非一贯统一的。对“中国”抱有这一看法的，并不仅仅是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不少论述。葛兆光就说过：“应当承认，有时候，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会引起一些问题的。”他并且强调：“……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

^① 参见 Pamela Kyle Crossley,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5 (Dec 1992), pp. 1468 - 1483。

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①

“新清史”对清朝的种种定位，也都是从这个基点上阐发出来的。笔者之一欧立德就曾明确表示：

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称为“中国皇帝”。^②

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直截了当地强调：

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这样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有助于让我们更敏锐地注意到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更不用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不同政治实体……然而，我承认我同时也会担心把这条“清朝”与“中国”之间的界线划得太过明显。^③

一石激起千重浪，当时的与会者对此的反响不一，有的将其视为一种挑战：“经历过‘新清史’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④，也有的被这种“挑衅”所激怒：

他们（指“新清史”部分作者）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它会带来互相关联的双重危险：一是破坏长期居正统地位的中国历史一元叙述，二是动摇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⑤

①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引言”，中华书局，2011，第5页注①，第31页。

② [美] 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载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

③ [美] 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载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

④ 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⑤ 刘凤云、刘文鹏：《“新清史”研究：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0期）2010年10月14日第4版。

于是，原来仅仅是对清朝性质的学术性讨论，就演变成了政治化的热点。看法更尖锐的是黄兴涛，他在《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中说：

清代满人是否认同与如何认同“中国”，这在以往的国内学术界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但对于美国“新清史”来说，这却无疑是一个需要明确提出并给予认真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被称之为“新清史”的学者当中，喜欢像罗友枝那样笼统地强调整个清朝统治期内“大清国”与“中国”为两回事者，差不多已成为一种流行观点。^①

这种本来“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却被“新清史”学者作为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提出来，这看来就带有某种“挑衅”意味了。所以黄兴涛又说：“若其所指为入关以后 260 多年间的大清朝，或至少包括入关后的整个阶段，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而难以理解——无论将它如何‘复杂化’，都是如此。”这一批评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似乎已成公论。

按照这些学者的看法，即清朝入关以后或至少从康熙时代开始，满洲人就已经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大清就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也即认同自己统治的整个国土范围为“中国”了：“在入主中原之后，满洲皇帝正式以‘中国’自称其全部统治区的国家认同便加快形成了。”在下文中，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清代前期在处理与域外的关系时，用“中国”二字指代全国领土是很普遍的现象。^②对此，“新清史”学者似乎并无异议。但笔者认为，在民族国家时代之前，国家名称的用法本来并不是一贯的，其含义多少有些偶然性、随意性，必须联系特定的语境，才能确定它的所指。郭成康就曾经提醒我们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只是与西方国家的接触之后，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③

“新清史”所希望的，不是要问“清朝是否等同于中国”，而是希望使有关“中国”的概念更为历史化（historicize），而不要把抽象的“中国”符号和具体的“大清国”（或者大明、大唐国等）混为一谈。事实上，一百多年前，这些就已经是中国思想家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把“清王朝”等同于“中国”，梁启超甚至表示，

① 参见黄兴涛《清朝满洲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载刘风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16页。

② 黄兴涛：《清朝满洲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

③ 郭成康：《大清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中国”从来不是国家的名字。^①这正与我们前面引述的葛兆光等人所说的“中国”是不断演变的概念相一致。黄兴涛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他说：“殊不知康雍乾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已非昔日的明代中国，而是被清帝、满洲人和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又加以再造过的中国。”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述一段罗新教授对于内亚史研究的相关议论，因为他的观点正好补充并印证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内亚史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绝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内亚史从来就没有、或绝少有可能不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交叉乃至重叠。完全脱离了内亚史的中国史，甚至不可能被记录、被叙述、被了解，而成为永久消失了的过去。同样，中国史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争论“清朝是不是中国”、“元朝是不是中国”、“辽是不是中国”、“金是不是中国”、“西夏是不是中国”、“十六国北朝是不是中国”，还有什么意义呢？^②

历代王朝中的哪一个是“中国”，哪一个不是“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伪命题，是只有在政治上才有意义而在史学中并无意义的。

第四个问题，“中国”与“中国性”的近代性。

如果辛亥革命前后的人士，也就是生活在满洲统治下的清朝的人士，尚且可以看出“大清国”和“中国”之间存在一个距离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更有必要认真面对这个事实，而不是以其“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而忽视它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早在清亡之前的1901年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就呼吁“中国苟欲图存于生存竞争之大潮，其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得到知识界的群起呼应。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为典范，着手从事于中国“国族”的塑造，包括提出一套以黄帝为中心的“符号政治”，打造出一个新的国族——汉族，进而构建起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活动，就此而轰轰烈烈地兴

^① 梁启超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又说：“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第9页）在这两段话中，梁任公明确指出的，就是我国从来都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名”，有的只是朝廷而已。

^② 罗新：《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魏晋南北朝文史论坛”，2013。

起。这一过程曲折复杂且内涵丰富，叙述这一过程又不是本文重点，好在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并有大量成果出现，这里就不拟多谈了。^①

至于有人将当代中国的合法性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认为“新清史”动摇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表明很多人对于共和政体与帝制的区别，对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与帝制下的臣民与朝廷之间的关系有何不同，对于创立共和国的民本思想等问题还是缺乏一些必要的了解。这种说法，也使一些西方学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本来以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 1949 年之后在巩固国家统一发展的努力下取得的种种成就，却没想到会与外国史学家们对清朝历史的解释做出这样的联系。

四 关于“新清史”的后设话语 (metadiscourse): 在 21 世纪如何书写中国的历史?

有人在谈到人大清史所编选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论文集时，做过如下概括：

这部论文集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态度，那就是“不敢苟同”。尽管大家都承认，“新清史”给清史研究带来了不少颇具启发性的论点，可以纠正以往研究中的若干偏差，但是——几乎所有中国学者谈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个“但是”——对于“新清史”刻意强调清朝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区别这一点，多持保留态度。^②

说几乎所有中国学者谈到“新清史”，都要加上一个“但是”，未免有些一概而论。将“中国学者”作为一方，“美国学者”作为另一方，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一种研究范式，这样以国别来划分研究者的立场，本身就是不符合学术精神，也不利于学术的深入发展的。事实上，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中，有不少人对“新清史”的态度相当积极，而美国学者中也有人对这种学说持不同意见，

^① 其中尤以沈松桥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28 卷（1977）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政治社会哲学评论》第 3 期（台北，2002）最为详尽并最具说服力。

^② 江风：《新清史之争：超越政治，可能吗？》，《中华读书报》2012 年 8 月 22 日第 9 版。

不仅何炳棣一人如此。^①

也曾有一些学者对“新清史”做过概括性的论述。如王晴佳说：“‘新清史’的研究，与当前西方史学界寻求突破和解构民族—国家史学这一近代史学传统的努力密切相关，而这一努力，又是他们希求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史学研究模式（包括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明清中国的研究，成了美国中国学家和中国历史研究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斟酌商榷的最佳领域，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那就是如何用中国历史的事实，质疑和挑战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途径。”^②

引用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对于如此重大和丰富复杂的问题，“新清史”学者也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也许在接触更多中国史料和现实之后，会有推翻定论的可能。而中国学者更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着有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探讨这一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的成果诞生。

对于本部分标题，亦即在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的问题，我们提出几点我们的看法，以供同行们思考。

（一）如何面对西方学术观念与理论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新清史”运用的理论、视角与方法，思考的问题与得出的观点，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上。此话不错，但问题在于，有关“国家”、“民族”、“汉族”乃至“中华民族”这一系列的名词和概念，本来就是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接受西方理论和观念提出来的。所以，只因为“新清史”的出发点与西方的理论体系有关，就确认它不适用于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如何面对西方那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令人应接不暇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这个问题多年来或隐或显，在学术界却始终存在，在如何对待“新清史”的问题上变得尖锐和敏感起来。有人将其视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认为中国学者迄今难以理

^① 米华健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会议上即明确宣称，所谓“新清史”并非一个学派。又如柯娇燕，虽然她的两部书（《孤军》和《半透明的镜子》）以及很多文章都被视为“新清史”的代表之作，但她自己对此却未必赞同。2010年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她曾公开表示：“现在从事清史研究的一些美国学者强调新清史，我对这个观点有些异议。新清史的主要观点是：一是，清朝是满族帝国，你要了解满清帝国的行为或看法，要先了解满族文化……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了解大清帝国，要先了解大清帝国的三个政府管理体系。新清史是要建立以满族为中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第二，我们看旗人是移民，当然他们学地方文化没有什么特别，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变成汉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从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观点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们特别重视满洲文化，不愿承认满洲文化改变了，中国文化不停地改变，当然满族文化也不停改变……”见汪立珍《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谈清学与清史》，《满族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王晴佳：《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解西方学术中不断挑战旧说，并将其视为学术基本精神的观念，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更愿意“沿袭”传统。^①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学者研究清朝史，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至于目前颇为流行的那种将西方理论方法观点盲目照搬，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对本国研究却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倾向，显然不值得提倡。

很多人同意这种说法，但笔者这里不肯苟同。这个问题，应该说包括了两层含义。

第一，所谓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事实上，建立在异文化观察上的异文化研究，不仅是人类学的宗旨，这其实也是史学的原则，因为史学研究的是过去，而过去是任何今人也进入不了的另一个世界，恰如从事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一样。所以有“历史是异邦”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对于任何人，本国的也好，他国的也好，都是同样的异邦，都是公平的。如果认为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来坚持研究的主体性，那么是不是说，美国人不能研究中国史，中国人也不能研究欧洲史，甚至河南人不能研究河北人的历史呢？这无异于说，不同地域、不同国别的人之间很难有沟通的可能性，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虽然不是中国人，照样可以研究中国历史，但还应该承认的是，不同国家或者国内不同民族的学者，会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受到自己文化背景、民族背景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他们的“文化关怀”往往是不一样的。例如，民族、族群以及帝国等问题，是美国学界而不仅仅“新清史”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并非针对中国。而中国学者也会有自己更关注的、与自己现实世界联系更紧密的问题，这并不奇怪。而不同的关怀，促使学者们从更多元的视角看待清朝的历史，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对中国清史研究的一种启发和促进。^②

总之，当我们评判一项史学研究成果的好坏、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理论的成败时，标准应该首先是它在学术上的价值，具体地说，它征引的史料是否坚实可靠、它的分析是否规范合理、它的结论是否给人以启示，至于它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中国还是外国、是否“建立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上”，反而应该列为其次。试问，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吗，它难道由于是来自外国，就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了吗？

① 王晴佳：《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② 可参考朱政惠、刘莉《柳暗花明又一村——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对话》，《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即以施坚雅为例，他以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为中心创建的研究模式尽管获得中国学者的广泛赞誉，有些也成为中国学者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但对他的著作、对他创建的模式质疑和批评，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乃至其他国家，都一直存在。对于这些批评，有学者认为“面对施坚雅，更应该反思的似乎是我们的知识和思维中究竟是什么缺席了，为什么会是这样”。^①“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国国情穷形尽相，但是，施坚雅模式提醒我们，早应该对明清以来就有的认识框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多学科多层面的，尤其是历史学的反思必不可少，因为施坚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国人所称的中国近代史。”^②后者更多强调要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持的是一种很为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也为学界所普遍认同并接受。我们认为，对于“新清史”，何不也参照一下这种态度呢？

对于这个问题，党为的说法在年轻一代中可能更具代表性：

由于我们现代的知识体系源于西方，目前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时代之下，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已经成为文化本身，成为我们的当代历史与现代经验的组成部分，从而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变成完全是整个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内部问题。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③

（二）超越政治，可能吗

有学者发表议论说：“国内学者对新清史问题有所回避的关键，不是其所运用的范式、理论或视角，而是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及其得出的结论挑战了国内清史研究的既成观点。”^④虽然国内学者有所回避并不尽是事实，而且“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的结论，正是来自他们所运用的范式、理论或视角，但他也确实指出了问题所在，那就是“新清史”挑战了国内清史研究的既成观点。这些既成观点，包括上述引文提到的“大一统”、“中国认同”以及“满洲汉化”、清帝国性质等，都是最根本性的、被中国史学界视为公论、多年来习惯于以这种公论进行思考、撰写文章并教育学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提出挑战，颠覆了中国百姓从小学到的，从来都以为是

① 孙明：《另一种“历史”》，《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20日。

②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载朱政惠主编《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第345页。

③ 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30页。

④ 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

最自然不过的常识，所以受到冷遇、质疑甚至提到政治高度进行批判并不奇怪。

将“新清史”学者的一些论点提到了“背后有政治目的”的高度，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待西方各种学说、流派时比较少见的。尽管也有学者呼吁将这种讨论置于学术范围之内，但怀疑与反驳之声也不绝于耳，恰便似上引文章的标题：“‘新清史’之争，超越政治，可能吗？”该文认为：

本书的编者曾在其他场合表示，希望将有关“新清史”的争论置于学术范围之内，避免将其政治化（《清朝的国家认同》序言），《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证明上述理想近乎自欺。“新清史”的某些重要论著至今还不能在国内翻译出版，一些论文还要因为“语境的不同”而作删节，甚至相关的学术活动也曾经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在如此剧烈的思想交锋之下，幻想将讨论限制在纯学术领域是完全不可能的。更现实的做法也许是，承认相关议题中的政治因素，但在讨论中分清楚哪些是学术的进路，哪些是政治的考量。^①

这段话讲得很诚恳，甚至也很大胆，所涉及的问题已经逸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对于单纯的学者来说，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也就是说，当这个问题被提到“政治化”的高度以后，“新清史”对于清史研究本身来说究竟有没有意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作为“中国”学者应该站的“立场”了。

笔者二人数十年治史的主要方向，都是清代八旗制度和满洲认同问题，却从未料到这个问题在今天会变得如此敏感。不可否认的是，清史本身确实早已政治化了，不仅是清史，所有的历史，包括像夏商周那么久远的历史，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因素，这种倾向从 20 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潮流。美国德州大学的李怀印教授在他撰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新著^②中说，自从“五四”以后，写历史变为一种要显示自己政治思想的途径，而不是自己对于过去的理解和解释。无论是 20 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还是 70 年代，无论是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20 世纪的中国史学都变成了服从于政治的工具。李教授认为，在 20 世纪中国的两个领域（历史、政治）之间，从来没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平衡。80 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终于可以开始脱离开政治、相对自由地寻找相对客观的解释架构与方法论。直到 90 年代以后，与中国在经济上根本翻身的同时，以前的模式和典范被颠倒了，却仍然没有找到新的模式来代替它。

① 江风：《新清史之争：超越政治，可能吗？》，《中华读书报》2012 年 8 月 22 日第 9 版。

②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2.

李怀印认为,为解决这一危机,历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寻找可以被历史学恰当使用的模式的阶段,这个模式,就是全球化。我们同意李教授的意见,但还要强调的是,史学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它的去政治化,而是刚好相反,现在的政治家更加依赖历史,尤其是清史,来达到政治上的诉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开始将目光回溯到清朝,来寻找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如何书写清史,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正像这种政治化的气氛会给史学家带来某种困扰一样,“历史化”也同样会令政治家头痛,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中国历史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内学者对于“新清史”的反应是各种各样、褒贬不一的,国外学者当然更是如此了。

尽管问题变得如此棘手,但书写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凸显出来。每个国家的历史叙事对那个国家、对全世界都很重要,而世界上的强国更是如此。正如布朗大学德国历史教授巴托夫所说:“当一个强国以它的过去作为决定国策的参考点(或者有如此的姿态),那么那强国的过去(或者对过去的理解)就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①在当代中国,这正是“中华复兴”、“盛世修史”等口号背后的思路。

结 论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阐述的那样,“新清史”提出的诸多结论虽然都给人以启发,但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最重大的意义,或许还不在于它的这些结论,而在于它提出了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像所有的新理论、新范式一样,“新清史”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国内外学者对它的批评和质疑也从未间断,其中有些针对的是某部具体著作、某个具体作者阐述的具体问题,也有些则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首先,虽然“新清史”提出以满文等非汉民族语言形成的档案史料的重要性,但他们中很多人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他们很多研究的结论并不是来自这些非汉民族的史料而仍然是汉文文献。而且,由于真正能够运用满文或其他非汉文史料研究所出的成果并不多,所以直到现在,这些史料究竟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在哪些重大问题上是因利用了这些史料取得的突破,呈现得仍不够充分。

^① 原文是:“When a major power determines its policies (or at least claims to do so) by reference to its past, then this power's past (or its understanding of that past) assumes a central role in world affairs.” 参见 Omer Bartov,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The Historikerstreit and German Reunifica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55 (Winter 1992), p. 174.

其次，“新清史”的有些作者由于把握语言和文献阅读等各方面的限制，出现一些“过度阐释”的问题，举例来说，他们强调满洲皇帝与传统中原王朝的皇帝不同的时候，总好以蒙藏等族首领将其称为“大汗”为例，但仅仅凭借这个称呼，而不进而以相关制度、事件为证据，是不足以充分说明在这些族群中满洲皇帝的真实身份的。至于一些著作中出现的对史料理解、阐释的“硬伤”也在所不免。

再次，某些“新清史”学者过于强调清王朝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性，但事实上，正如罗新教授在《内亚视角的北朝史》一文指出的那样：“新清史所引发的‘清朝是不是中国’的争议，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十分特殊，与其他历史阶段迥然不同。其实，中国历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内都存在类似清朝的问题，而另外一半时间中国史又与内亚史有着无法切割不可分离的重叠……内亚史从来就没有、或绝少有可能不与内亚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交叉乃至重叠。完全脱离了内亚史，甚至不可能被记录、被叙述、被了解，而成为永久消失了的过去。”这个意见确实切中要害，只是要真正做到这点，亦即将对清史的研究与对清朝之前诸多王朝的研究贯通起来考察，是以个人或几个人之力难以做到的，需要清史学者与研究其他各断代史乃至内亚史等众多学科学者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我们期待日后有越来越多学者加入到这样的合作之中。

最后，一些美国“新清史”学者与中国学者交流不够，对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成果不甚了解，甚至茫然不知。

但是，“新清史”确实打开了一条路，一个新的视野，很多人从这个视角，已经看到了很多以前未曾关注的问题，无论中国学界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它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而“新清史”从面世到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多年，它究竟会不会到此止步，会不会继续发展，或者说，它是否还有未来，这取决于年轻一代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学者对它的接受和理解程度。从目前来看，无论是中国年轻学者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对“新清史”的关注程度上，还是从美国攻读中国史的学生的论文选题上，都可以看出“新清史”强劲的发展势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学习满文满语、注重满文档案，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研习清史的学者和学生的共识，并在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新局面，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会呈现得更清晰。此外，“新清史”还提醒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要注意打破“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界限，因为要对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有深入了解，不了解清朝前半期的和内亚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好的，反之也是一样，研究清朝早期历史的学者也有必要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更多地交往、沟通。

最后我们还想说，是，“新清史”提醒我们，在 21 世纪这样的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术也必然像中国的经济一样走向世界。将中国历史的变迁从全球的、世界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已经不再是一种空谈，而是一个趋势，这是所有研

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无论国内、国外的，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和西方学界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还有相当大的甚至难以调和的距离，而且在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短期内不仅难于达成一致，甚至无法对话。但是挑战毕竟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史学家是仍然埋首于自己研究的具体课题，还是自觉地把“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已经是希望“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①的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事。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对历史与历史学意义的基本观念和认识。总之，我们的历史是为谁而写，在未来的“后民族国家转向”的世界里，历史应该如何写，是本文在最后向我们自己也向我们诸位同行提出的问题。

本文写作得到众多朋友、同行的大力支持帮助，并在初稿写成后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特此致谢。

[作者定宜庄(女)，194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欧立德，1959年生，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3年6月6日

① 原话参见马戎：“现在，国内有些清史学者已经在反驳美国的‘新清史’。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面包含着中国人如何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问题。”（《给少数民族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完整的公民权利》，《中国民族》2011年第9期）欧立德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3年5月6日的演讲中则回答：“在二十一世纪这样全球化的世界里，期待中国的历史学家能够‘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是不太实际的”，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所谓“学术话语权”应该是多元的，而不应该、也不可能为少数人所垄断。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或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多种多样的解释，所以，掌握某种话语权的说法，是不实际的。